

## 消灭私有财产权是返古开倒车

王裕延

发布时间: 2013-05-14 09:21 作者: 王裕延 字号: 大 中 小 点击: 604 次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用一句话来表示：消灭私有财产权。”我认为共产党人的这一诉求，是返古开倒车，最终要使人类社会返回到原始野蛮的首长专制的部落主义时代。

据古人类学家的考证，原始公有制社会曾存在数百万至千万年之久。在这漫漫的岁月里，以血缘关系为脐带的古人类群体，凭借简陋的石器工具，在狭小的生存空间艰难地生存繁衍。他们靠集体采集狩猎生活，部落酋长拥有极大的权威。崇拜部落酋长，崇拜英雄的气氛弥漫整个原始社会，使英雄崇拜和权力崇拜已成习俗传承。经过漫长的岁月，随着劳动生产经验的积累，出现了以男性劳动为主体的畜牧业和种植业，逐渐出现了剩余产品。而这些剩余产品自然而然地全归男子所有。妇女参加它的消费，母系氏族社会也由此过渡父系氏族社会，私有制，贫富分化和阶级也随之产生。到此时，原始公有制逐渐瓦解崩溃。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男子在家庭中的统治权业已确立，男子独裁专权的家庭出现了。私有制的产生，拧断了原始部落社会的血缘脐带，打破了狭小部落地区的封闭状态，使不同氏族部落的成员开始杂居起来了，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开启了从封闭野蛮的原始部落主义社会向开放文明社会过渡的大门。

最初的私有制是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最初的家庭，就中国而言是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家长是由富有劳动生产经验的男性长者担任，他拥有领导生产，处置家庭财产，安排家庭生活的专断权，是现代独裁专制者的始祖。这种家庭专断权，在学术界一般通称父权。在中国，许多源于同一部落氏族的私有制家庭组成姓氏宗族，这种家庭尽管散居各地，但各姓的姓氏宗族长还是继承了原来部落酋长的余威而成为族权。后来在父权和族权的基础之上便产生了国家政权。而政权、族权、夫权，加上英雄崇拜产生的神权（而佛教是崇拜外来英雄的产物），就构成了毛泽东所说的束缚中国人民的四大绳索。国家政权，特别是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的中央政权，于公元前 216 年公布了“令黔首自实田”的政策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地主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把原始公有制瓦解以后形成的私有制用国家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的私有制代替原始公有制已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秦始皇肯定的私有制是一种和政治权力紧密结合的私有制，是一种为中央集权专制服务的私有制经济，是靠暴力和权力催生的一种经济体制。获得土地的黔首，他们多数都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中立过战功的英雄功臣，在政治上是拥护中央集权制度的。出身地主家庭的广大士群，是官僚的源泉。他们的利益在于做官食禄，得禄多的叫做官，得禄少的叫做吏。“禄”，是指皇帝赐予的土地。这批士群把持了从中央到地方郡县乡里的各级政权。不得禄的叫做未仕的士，他们把持了乡村宗族权和广大寺庙的方丈主持。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掌握了多数土地，手工业由官府垄断经营。商人虽然拥有巨大财富，但在政治上备受压抑贱视，被视为四民之末，不得着丝织衣服，不得携带兵器自卫，不得乘车骑马，不得做官吏。这种产生于民间民营的私有制经济被中央集权政府视为异己的经济体制，是属于异己的社会势力而备受中央政府的压抑贱视。于是商人就把他们的巨额财富用于建豪宅置田地，成为有市籍地主。控制大量土地的地主、宗祠公堂和寺庙把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挤压得喘不过气。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沦为佃客农奴庸人、沦为奴婢。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是属于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弱势群体。致使中国形成了几千年一贯制的尊卑、男女、长幼之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像万能胶把中国人粘在土地上不能动弹，粘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上不能有所作为，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使中国人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而不能自拔，长期成了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进步发展的重大障碍。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雨东渐，自由民主的雨露开始在中国播洒，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列车已经驶到中国的家门口，但是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成了中国通向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使得近代中国贫弱不堪，横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凌辱，使中华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在这充满内忧外患的苦难时代之中国出现了三个历史伟人，这就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研发制定的“三民主义”，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确立了他在海内外华人圈中的崇高历史地位，备受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尊敬，到现在为止，中国伟人中还未出其右者。蒋介石和国民党借着北伐与抗战的胜利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争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毛泽东和共产党利用土地革命剔除了乡绅地主保甲在农村里的垄断，斩断了捆绑在中国人身上的四条绳索，使社会上下层因素同样有平均发轫之机会。这就为中国由封闭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开放的商业社会的过渡创造了机会，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交换互利的市场经济的过渡创造了条件，也为几千年的尊卑、男女、

长幼的单元社会秩序转变为自由、民主、平等的多元社会秩序扫清了障碍。

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前夕，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演讲。他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存在“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的中国之命运。”光明的命运，“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黑暗的命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应当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毛泽东的演讲表达了全体中国人的意愿，包括国民党人的意愿；因为国民党也在第六次全国党代会上稍先提出了要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匀富、统一”的中国之革命纲领。两个政党的治国纲领都很伟大很光明，都出自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此，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争论，不是光明的中国和黑暗的中国之争，而是由共产党，抑或是由国民党来主导建设光明中国的领导权之争，总之，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的所谓的“两个中国之争”的口号，本质上是指权力之争和正统之争。如果把争领导权，争正统说成是光明和黑暗之争，那末，毛泽东在此犯了把“权力”和“正统”看成是成光明和真理的错误，这种思想观点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糟粕。由于毛泽东和蒋介石死抱“权力”和“正统”之争的方针政策，寸权必夺，寸土必争，针锋相对，毫不退让，最终引发了一场像李宗仁描述的“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庐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之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一惨绝人寰之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的国共两党争夺最高国家权力的内战。国民党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内战中失败了，只得退守台湾一角，潜心实施其“自由、民主、匀富、统一”的三民主义的建国纲领了。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已经争得国家主权的独立，这是不争的事实，任何力量也无法使中国退回到不独立的状态。正如满清专制封建王朝被推翻后，任何复辟君主专制的意图都不能得逞的道理是一样的。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前进而不是倒退，封闭专制的极权主义的社会向开放自由民主的社会转变，乃大势所趋不能逆转。所以抗战胜利后，认为中国还有可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丧失民族独立的、黑暗的旧中国，这是危言耸听，是毛泽东惯用的宣传伎俩；而这种危言耸听竟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了。因此，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最关注的不是大人物的宣传口号，而是大人物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口号兑现，使中国变成名副其实的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使中国的百姓大众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大陆和台湾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历经了各种曲折和困难，取得了令世界艳羡的成就。

国民党坚信只有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理念，因为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借鉴欧美各国的先进文化，借鉴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之精神，借鉴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的治国理念，是真的而不是假的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念。这是“民为贵”、“民为邦本”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延续和发展，已成为当今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核心。它的著名观点是：“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计民生之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也。”国民党在台湾就是按照三民主义“节制资本”，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使中小企业遍布全岛，使其不受少数资本家操纵控制；实施三民主义的“平均地权”，大力发展农林园艺，使小农场，小果园星罗棋布点缀台湾，使其不受少数地主操纵控制，从而创造了世界奇迹，使台湾迅速地由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转变为开放的交换互利的市场经济，使台湾成功地实现了尊卑、男女、长幼的单元社会向自由、民主、平等的多元社会的转换，使台湾百姓大众的生活水平提升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台湾成了由封闭的农耕社会向开放的商业社会转变的样板，充分显示了三民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实现了蒋介石要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目标。公元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台湾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动荡，但这不能归咎于三民主义，这是民进党中独派势力作祟的结果。“台独”分子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张之日起便反对三民主义，践踏三民主义，视孙中山为“外国人”，把三民主义抛之九霄云外。令人深思的是，毛泽东取得了大陆的政权之后，便背弃了自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宣布的“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和台湾民进党的台独份子一样把三民主义抛之九霄云外，从而把中国大陆引到长期的社会动荡之中。可见，在中国无论是大陆或台湾，只要背弃或抛弃了三民主义必然会引起社会大动荡。可见，孙中山创建的三民主义是中国繁荣昌盛之本，是维护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向前发展的根基。

随着国共内战的结束，1949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召开了各民主党派共同参与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依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制定了《共同纲领》。刘少奇称《共同纲领》是“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2）确认了“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3）这种新民主主义本质上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那末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当时就已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封建社会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绕过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谈社会主义，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根据这种观点，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是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通往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这就是刘少奇说的，“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按照刘少奇的设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要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相当长的时期。这种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既不同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这个社会的国家领导权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手中，而是掌握在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手中，用现在的话说，是掌握在“三个代表”手中。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搞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实行公有制，正如刘少奇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4）即消灭私有财产权。因此，刘少奇主张应当使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并提出“先机械化，后合作化，不要怕农民冒富，党员也可以当富农”的著名观点。（5）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6）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提出的“应该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他尖锐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7）这是非常有见识的理论观点，可惜被一意孤行独裁专制的毛泽东一棒打入政治冷宫。针对这危险和空想的社会主义，刘少奇认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这不是一个暂时的政策，而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8）不动摇私有制，允许富农经济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9）当然更是三民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刘少奇大声疾呼：“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雇工与否，应有完全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10）刘少奇之所以认为私有制不可怕，两极分化不可怕，富农经济业已发展不可怕，就是因为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可以“到将来适当时期予以限制，如实行农业累进税等。”（11）基于上述认识，所以刘少奇批评高岗对富农成为党员的恐惧心理时指出：“即使东北将来有1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认为当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12）刘少奇对私有制的观点，对富农经济的看法，表面上看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先发展生产力，然后再实现生产关系变革的理论提出来的；而他的实际理论根据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也是后来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利用私有制的潜力，大力发展生产力，先机械化，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然后再合作化，实现社会主义的变革，即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在党内获得了广泛支持。1951年，中央批准华东和华中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布告，明确规定“允许富农经济发展”，“劳动雇佣自由”。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的邓子恢，他却曾积极倡议搞“四大自由”，即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13）借以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张闻天坚决认为，不要过分害怕农民自发倾向引起的两极分化。农村出现的土地买卖、租赁现象，大部分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调整生产引起起来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当工人，他家的土地无人耕种了，与其任其撂荒，不如出租出卖对生产更为有利。这类土地买卖，租赁现象，不能叫两极分化。对真正的两极分化现象，乃以采用税收，金融等手段加以控制，只要工作做得好，消极的一面不致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因此，张闻天主张：凡有利于土地的合理使用，有利于社会分工的租田、买卖及移居，我们不应反对。这是真知灼见。张闻天在共产党内较早捕捉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耕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变等重大问题，然而未引起党内领导层的重视。（14）周恩来肯定刘少奇的观点“本质还是对的”。（15）长期和农民一块扎根生活的著名作家赵树理也认为，“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积极性。”这许多事实证明，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不是心血来潮，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他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视为独立的社会形态，并要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很长的时间是有根据的。他关于“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的构想是比较理性的。诚然，刘少奇的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出发点是为了“很久以后”能“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这种观点尽管被打上历史主义的烙印，也充斥着马克思主义的空想浪漫主义的色彩，但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构想若能付诸实践，这对推动中国大步迈向开放社会还是能产生积极作用的。然而他的理性构想却遭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和严厉批评。毛泽东坚决认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搞资本主义，“走台湾的道路。”历史主义的对极性思维观念，“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行事方式，使毛泽东拒绝背弃了自己曾誓言要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从此，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构想被毛泽东一脚踢进历史的迷宫里。但是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构想，却为后来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蓝本。如果刘少奇有幸像邓小平那样长寿，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非刘少奇莫属了。毛泽东严厉批评刘少奇代表的观点是“走台湾的道路”，无非是指责刘少奇搞三民主义。那末，什么是三民主义？前面已经说过，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借鉴欧美各国的先进文化，结合中国文化中的“民为贵”“民为邦本”的核心价值观观念而形成的，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念，已经成了当今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观念。它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革理念，请看毛泽东是怎样说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毛泽东既然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

领，即新民主主义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那末“走台湾的道路”又何错之有呢？我们知道，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归根究底都是从“民为贵”“民为邦本”的传统文化中孵化出来的价值观念。当今共产党提倡的“为人民服务”和“权为民所用，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观念，都可以检测到三民主义的基因。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和三民主义所指引的道路，同是属于地地道道的中国道路。把实行三民主义贬为“台湾的道路”，贬为“台湾的价值观念”，这是毛泽东惯用阶级分析得出的错误结论，这是一种撕裂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加深扩大国家民族分裂的错误行为。

既然毛泽东不愿意走新民主主义或三民主义指引的道路，那末他要走什么道路呢？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他不仅反对用三民主义，同时也反对用新民主主义救中国，于是他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口号。而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没有私有制，即“消灭了私有财产权”的社会主义，是没有个体经济，更不允许富农经济存在的社会主义；一句话是苏联版的社会主义，是俄国人走的路。他主张“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和刘少奇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点刚好相反。这种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后提出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存在天壤之别。这种改革后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允许私人企业存在，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安营扎寨。其宗旨就是要在维护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释放个人的首创精神和独立精神，推动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实行可控性的转变。正是这种穿着社会主义外衣的三民主义赋予古老的中国以回天之力，使中华民族创造了世界奇迹。从“走俄国人的路”开始，最终还是要回到“走中国人的路”，这是毛泽东没有料到的结局。这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用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选择中国发展道路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坚持“走俄国人的路”的最大杰作“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事。”那末，毛泽东使私有制绝种，即“消灭私有财产权”的决策，究竟好在哪里呢？1949年毛泽东建国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消灭私有财产权”就是开倒车，使中国完全陷于自我封闭的状态中，从而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这是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发生大动荡的根本原因，充分证明毛泽东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预言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现在我们来探讨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作出“使私有制绝种”的决策呢？使私有制绝种，这不是毛泽东的首倡发明。私有制的出现迄今有数千年的历史，是在原始公有制的瓦解崩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私有制的形成，使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出现了阶级，出现了国家。使习惯了原始公有制生活方式的人，使吃惯了“大锅饭”的人，使那些天塌下来由大家共同顶着而害怕承担个人责任的人，对此很难适应。因此，要求废除私有制，返回原始公有制状态中生活的呼声一直未停止过。这种呼声通过一些思想家和学者表现出来，因此几千年来抨击私有制，废除私有制的言论时起时伏源源不绝。据史料记载：两千多年前的希腊雅典，有位著名的思想家也是独裁专制主义的老祖宗柏拉图最早提出私有制是腐败之源，是制造社会冲突，导致社会腐败的邪恶力量；他主张用斯巴达城邦国家的部落主义公有制取代雅典的私有制；他支持斯巴达反对民主雅典的战争；主张借助劝告与强迫相结合的手段使雅典废除私有制，恢复公有制。从而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把雅典建设成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以斯巴达城邦部落主义国家为模特。为了使“理想国”的统治阶级保持团结免于分裂，从而避免“理想国”瓦解灭亡和发生“和平演变”，柏拉图认为“主要是靠消除可能导致分裂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的节制是通过实行共产主义来实现和控制的。即通过废私有财产权，尤其是废除贵重金属的私有制来做到这一点。”柏拉图主张要像斯巴达人那样禁止私人办伙食，要大办公共食堂，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供给制，使“理想国”的公民避免过于贫困和过于富足的生活。只有一种既不为极度匮乏，也不为大量财富留有空间的共产主义体制，才能把经济利益降低到一个最低限度，并能确保统治阶级的团结。所以二千多年前，柏拉图已经非常自觉地意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原始公有制社会的解体，封闭社会的瓦解，私有制的产生，在柏拉图看来，这就是“人的堕落。”（16）因此，是柏拉图最先提出必须使私有制绝种，重新回到原始公有制社会里的施政纲领。但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最终像肥皂泡一样破灭。其原因不是因为柏拉图的理想不够崇高，而是因柏拉图一味复古，开历史的倒车，要阻止社会的变化。这充分说明凡是要开历史倒车的人，不管其动机如何高尚，如何信誓旦旦，不管他信仰的是什么主义，什么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呀，什么坚定不移地站在大多数一边呵，什么要解放全人类呀，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把二十世纪的毛泽东和二千多年前的柏拉图做比较性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两人之间的基本观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充满着使私有制绝种的幻想。很多中国人会认为这是耸人听闻，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怎么会和二千多年前的一位希腊伟人有沾亲带故的关系呢？稍加分析，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中国人喜欢讲道统。柏拉图是历史主义的开山祖师，他的重要继承人是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而马克思又是历史主义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则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所以毛

泽东和柏拉图具有相同的道统基因。这种基因反映在他们对“理想国”有基本相同的观点。毛泽东想要建立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泽东要建立的国家与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很相似，没有私有制、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是充满社会公平正义的国家。为了使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即工人和农民保持团结免于分裂，毛泽东和柏拉图一样，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废除财产私有来做到这一点，他们都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毛泽东最害怕的是私有制产生的贫富分化，认为贫富分化会导致工农联盟分裂，招致农民的愤怒和不满，最终危及他辛辛苦苦用枪杆子夺来的政权。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写道：“封建所有制被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富农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拉，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了土地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17）这段话表明毛泽东梦寐以求的“理想国”因贫富分化而面临重大危机了。出路何在呢？使私有制绝种，“消灭私有财产”，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从而使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古老中国全面恢复已经失效几千年的公有制。

废除私有制，这是从整体上重建社会，是名副其实的扫荡性的变革，是一场风险极大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试验，它必然涉及整个社会，牵动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和神经，没有非凡的意志和毅力，没有坚定的信念，是无法想像的。那末，是什么信念支撑毛泽东做出了“使私有制绝种”的决策呢？我认为促使毛泽东做决策的信念是：（甲）“五四”以后的中国，凡是决心献身革命与政治的志士仁人都挟着一大包袱的“理想”或“主义”。毛泽东也不列外，他坚信历史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毛泽东视这种理想信念是一种历史使命，实现这种理想信念就是实现历史使命，它将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历史主义赋予的使命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相表相里，而这种信念又是建立在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确信无疑的基础之上。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坚信辩证法的。他写的《矛盾论》确立了他在中国理论界的龙头地位。辩证法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是在一个矛盾的框架之内运动变化的整体，马克思则把人类社会视为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组对立统一的矛盾构建起来的一幢高楼大厦。人类社会的变化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斗争引起的，开始是量变，然后引起质变，最后达到否定之否定的结果。这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师徒俩创造发明的现代辩证法，也是毛泽东坚信不疑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魔力无穷，具有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社会的全部功能，是上帝的另一种称谓。它使奴隶主私有制代替了原始公有制，使封建农奴制代替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使资本主义代替了封建主义，最终要导致否定之否定的决定性革命，公有制又要代替私有制，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柏拉图的“理想国”，《礼记》中描述的“大同社会”就要在辩证法的魔力帮助之下变成现实了。就是说，辩证法运动的结果，必然出现毛泽东预想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之类的结果，（18）就能彻底清除世界上的罪恶之源，建立一个美丽崭新的世界。对黑格尔马克思这种辩证法魔术变化结果的期待，毛泽东一生坚信不疑。（乙）是建立在绝对相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矛盾分析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通过对商品这个细胞的内在本质的分析，发现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现了资本家的财富和无产阶级的贫困苦难同步增长的规律，必然会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必然会引起工人生活的绝对贫困，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的这一研究成果被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确信无疑，当然也使毛泽东确信无疑。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方法，使用的是一种本质主义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得出了不可避免的历史主义宿命论的结论。而这种宿命论像兴奋剂被注射到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身上而使其亢奋不已，严重妨碍了他们正确思考判断理解马克思的这个结论。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使他们无法理解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是研究 19 世纪以前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即“无约束的资本主义”）所得出的结论。那时候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只是充当财产守夜人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只是消极被动地适应保护，所以使经济危机时有发生，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还爆发了一场近乎毁灭性的经济危机。但也是从那时候起，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社会生产进行直接的干预调控，利用税收、遗产税为杠杆抑制财富的集中；制订反垄断法，限制恶性竞争；完善劳工立法和社会养老保险，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资本主义国家由消极被动适应保护社会生产，转变到积极干预调控社会生产，成功解决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使市场经济更加成熟，成了当代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这证明了马克思应用本质主义或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变化所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理论必然导致一种历史主义宿命论，误导人们用非理性的方法，对社会进行扫荡性的变

革。与此相反，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由于无法克服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而弊端百出，最终宣告破产，改头换面恢复了私有制。由于毛泽东沉醉于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宿命论和热中阶级斗争而不醒，对经济问题很少研究或根本未进行过什么研究，只是在1958年大跃进后，因吃够了盲目蛮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苦头，才倡导全党读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一书。而毛泽东选择的这些书又都是运用柏拉图的概念和思维方法写成的。柏拉图说过，只有观念是实在的，易死的东西是非实在的。按照柏拉图的观点，所谓观念、形式、本质、规则是静止的、神圣的、实在的；而活生生的，现实的东西是易死的，衰亡的，从而把“实在”与“表象”、“本质”和“非本质”割裂开来。因此毛泽东提倡读苏联的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著作的结果，只找到了一堆柏拉图的规则、本质和理念等神圣的观念，一头扎进柏拉图观念的死胡同中，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更加僵化封闭。对所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活生生的经济领域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却不屑一顾，把它们看成非实在的易死的腐朽的反动东西，用阶级分析的粗暴方法简单否定之，从而对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演变特征一无所知。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还停留在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认识水平上，根本不懂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则，对现代资本主义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文化成就一概视而不见，可以算得上名副其实的“不知汉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从而盲目陷入要使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绝种的乌托邦的空想中，盲目陷入社会主义必定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主义的信念中。（丙）是建立在“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的信念基础之上的。（19）毛泽东坚信，农民既然能不顾身家性命跟随共产党暴动夺权，也一定会坚定跟随共产党去废除私有制。理由是共产党帮助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民一定会跟共产党走。毛泽东还坚信，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什么事情都能办成。他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问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20）既然共产党的领导可以创造一切人间奇迹，可以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又何尚不能使私有制绝种呢？这就是毛泽东的思维逻辑。这和蒋介石以不可能为可能，不承认困难，甚至否定客观事实，认定“唯信仰可以移山”的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如出一辙，这是典型的东方夸大狂。他忘记了没收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财产权和使私有制绝种是有天壤之别的两码事，前者只涉及少数人的利益特权，后者牵涉的亿万苍生利害攸关的大问题。对于如何摧毁少数人的特权，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大大小小数百次农民起义都未取得实质性的效果，风暴过后特权依旧，说明经济特权不能简单地使用暴力去摧毁，只能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去抑止消除。而毛泽东领导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战争就是属于这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如何使私有制绝种，在中国是毛泽东首次把它提到社会改造的议事日程上。毛泽东借鉴苏联农业集体化大搞强迫命令的经验，动用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办法，也就是柏拉图的“借助劝告与强迫，使公民成为统一体”的办法；（21）宣传上，用不负任何责任的空口许诺和大开不能兑现的社会主义支票去欺骗农民；组织上，采用过去在农村暴动夺权的办法，“在农民中划分三六九等，谁最穷就把谁当成依靠力量”，“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树立贫下中农优势的思想”，（22）通过忆苦思甜、组织贫协的办法，硬是把五亿农民驱赶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把全国的手工业者组织到手工业合作社中，把大大小小的私营工商业纳入公私合营的经济轨道，尔后并入国营企业或成为集体企业，从而实现了使私有制绝种的宏伟计划。但是毛泽东建立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宣告了两个“应当相信”的破灭，证明了两个“应当相信”是典型的愚民哲学。事实证明，依照革命领袖的主观意愿，依靠行政命令或各种政治、经济压力强行构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二十世纪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使绝了种的私有制逐渐恢复发展，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获得很大改善。无独有偶，苏联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乎一夜之间解体，公有制也随苏联的解体而寿终正寝。

斯大林和毛泽东先后进行的使私有制绝种的闹剧，和唐·吉珂德与风车搏斗的闹剧一样荒唐怪诞，发人深思。私有制真的像柏拉图和马克思主义者说的那样邪恶可怕面目可憎吗？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说明了私有制的形成和产生有充分的理由和合理性，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纯经济发展的产物，所以斯大林和毛泽东一群人无论使用什么魔方也不能摧毁它，因为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私有制是一种富有弹性的社会系统，不仅富有适应力，而且较能够收摄高度技术化的知识和技巧。私有制是使封闭的原始公有制社会迈向开放社会的标志，是开放文明社会的载体，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有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独立行动人的手里，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23）正是私有制结束了把人当工具的时代，开辟了把人当目的的时代，使人大开眼界，使人认识到人类个体是目的，而不仅仅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24）极大地激发了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性。苏联和中国消灭私有制的社会实验表明，没有私有制，使人人都被置于特定的政治网罗中生活；没有私有制必然会使人道德、理想、是非、曲直、美的情操、高尚的意境受到动摇，甚至被迫放弃。请看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披露的一件事，据中央1959年3月15日批转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的报告讲到：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跑马乡的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

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会一开完，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之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跑来挖。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这位乡党委书记说：不过这一条，还得请示上级。（25）幸好这位党委书记还有组织观念，没有忘记“请示上级”，否则，那个跑马乡就要“共产共妻”，社会就要乱套，就要倒退到原始部落社会了，当代人的道德理想、是非曲直、美的情操和高尚的意境就必将发生动摇或被迫放弃。因为没有私有制，人最容易被掌控生活资料的政治集团控制，所有的人都必须仰承其鼻息而求生存。我们还可以从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披露的史实来证实这一判断。他写道：“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除了强化‘共产风’以外，还使‘共产风’和‘命令风’结合在一起，使一切平调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社合一后人民公社的行政命令，较之原来政府机关要严厉得多，也方便得多，因为社员吃饭在食堂，吃饭权操纵在干部手中，如果碰上了不正派的干部，你违抗命令，或执行命令很不合意，他就可以剥夺你的吃饭权，叫你以至全家挨饿。因此，有些地方的农民，谈起‘共产风’时，说上级搞‘一平二调’，比老鹰抓小鸡还容易。老鹰抓小鸡，小鸡还能叫几声，现在平调你的东西，谁也不敢吭一声。”（26）以致刘少奇感慨万分地说：“在吃饭问题上把群众卡起来，那比捆绑还厉害。”（27）这样，人的意志，人的理想，甚至个人的尊严，只好收起来顾不得了。因此，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结果是使个体的人成为工具，成为人类总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工具，从而凸现了掌控生活资料的个人的强大地位，使其成为历史运动的中心，人民的领袖，芸芸众生的代表，普通蚁民的命运主宰。这些人就是古代部落主义英雄的复活，是大大小小级别不同部落酋长。由这批人当权的社会，必然充斥着用马克思主义外衣包装的古代部落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野蛮残忍的风俗陋习，必然使人类的历史返回到原始野蛮恐怖的时代，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对此有深切体会。

废除私有制的思潮之所以能滋生泛滥的原因，这固然和私有制存在的某种局限性还不够完善有密切的关联，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和几百万年人类形成的习惯势力作祟有关联。列宁有一句名言：千百年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列宁的意思是千百年的私有制习惯势力威胁危害共产主义的幼芽。现在来讨论列宁在《论义务共产主义星期六》一文中的“新生事物”是很有意思的。究竟私有制是新生事物的幼芽呢，还是公有制是新生事物的幼芽？众所周知，判别某一社会现象是“新”还是“旧”，主要依据是看其形成产生的时间顺序。时间越古老的是“旧事物”，时间越近代的是“新事物”，这应当是没有疑义的公论。此外还有判定某事物是新还是旧，其重要标准要看其是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有就是新事物，没有便是旧事物。我们知道，根据古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类迄今存在已有数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的历史，而私有制的产生只有几千年还不到一万年的历史。私有制和公有制相比较，私有制还处于婴儿时期哩！在私有制产生以前的几百万年中，我们的祖先一直生活在“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公有制共产主义社会里，平均消费狩猎采集而获得的劳动产品是其重要特征；不这样平均分配消费品，我们的祖先势必被饿死；所以平均主义在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成了人类的“保命主义”，构成了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依靠平均分配集体劳动获得的生活资料，我们的祖先才得以生存下来。因此，在几百万年或上千万年的人类历史中，“平均主义”被视为神圣的原则而传承下来，在人类的意识中根深蒂固而成为许多人的一种本能的行动要求，这是其他任何观念形态无法比拟的。那末共产主义观念牢固呢，还是私有制观念牢固呢？从我国的历史经验看，我认为共产主义观念牢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我们一直把合伙平均分配的公有制共产主义当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幼芽给予高度赞扬，把许多属于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不愿被平均分配的正当行为，当成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猛加批判，这都是几百万年公有制共产主义习惯势力作祟的结果。毛泽东大力提倡的“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和林彪宣扬的“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正是公有制共产主义习惯势力作祟的缘故。因此，列宁说千百年来私有观念的习惯势力威胁共产主义的幼芽，这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事实上几百万年的公有制共产主义所形成的观念习惯，即绝对平均主义和“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传统习惯，已经成为人类的基因代代相传，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旧习惯势力。我们过去一直把平均主义看成是小私有制、农民个体所有制的千百年来习惯势力，真是天大的冤枉。因此，把“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否定个人基本权利的原始公有制陋习，当成新生事物给予高度赞扬，当成革命英雄主义，当成崇高的道德楷模加以宣传，这都是悖于历史事实，是对历史无知造成的错误。这类颠倒是非，颠倒历史的观念习惯，便成了千百年来要求废除私有制的思潮和空想社会主义泛滥的原因。历史事实证明，公有制能保障社会公平，但妨碍社会效率的提高，却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是公有制失效被淘汰的根本原因。私有制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率，却会使社会显失公平，影响社会和谐安定；但是私有制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发展。当人类进入二十世纪，逐步学会了通过完善立法，抑制因私有制产生的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大大消除抑制了私有制产生的弊端。因此，私有制对公有制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私有制能够确立，能够取代公有制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平均主义是公有制共产主义的产物，它是为巩固公有制服务的，是上古年代维系部落酋长绝对权威的社會根基，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专制独裁主义者凝聚人心树立绝对权威的重要工具，是历代的专制独裁主义者，比如二千多

年前的柏拉图、六百多年前的朱元璋、二十世纪的列宁、斯大林和希特勒都钟情于平均主义的重要原因。在未夺取政权之前，平均主义是热衷权力的风流人物号召发动穷人造反的旗帜，夺取政权之后，平均主义便成了红眼病的传媒，成了贫穷社会主义的理论支柱，成了国营企业挤压私营企业的黑手，成了掩盖特权阶层共纳税人之产的烟幕弹，成了有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滋生风长的催化剂等等，总之一句话，平均主义是威胁危害私有制和威胁市场经济的可怕势力，罪恶滔天，祸国殃民，是为使历史返古开倒车推波助澜的反动社会思潮。

废除私有制，“消灭私有财产权”，使私有制绝种，就是要回到自然中去，回到平均分配产品的公有制共产主义社会里，回到充满原生态气味的部落主义父权时代，这也就是当今一些预言家热衷追求的一种返古开倒车的思潮。这类预言家在不知不觉中追求的是部落主义失去的统一。回到他们所宣扬的封闭社会就是回到牢笼和野兽中去。（28）而追求和捍卫少数人控制的不受任何约束和制约的绝对权力，即使用什么特色理论加以装饰，最终还是要回到“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封闭社会里。在这封闭的社会里，人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是螺丝钉，是整体的一个器官。人与人之间虽然实现了某种社会公平，即大家都成了做权威主义的工具的公平，成了做螺丝钉的公平；但却使社会效率停滞下降，使社会失去了进步发展的动力，人民的生活势必长期陷入贫困状态中，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致使阶级斗争哲学甚嚣尘上，专政机器不堪重负；这种倒退复古的趋向，必然要使社会开放严重受阻。斯大林和毛泽东独揽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大权，其结果使苏联和中国的社会进步停滞不前。使苏联社会回到了俄罗斯民粹派神往的农业公社，回到了莫斯科大公国的时代。使中国社会回到了“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大同社会”，回到了“桃花源里可耕田”的时代，回到了“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太平天国时代。呜呼！这样的时代的确是“无处不均匀”，但却回到了多数人都饥肠辘辘的专制落后野蛮封闭的社会里。

综合上述可见，“消灭私有财产权”是人类思想意识深处“法古”价值取向、平均主义作祟的缘故。中国是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悠久的历史，可以使人自豪得意，也为中国许多伟人施展抱负提供了无边无际的遐想空间，凡事都力图从古籍中寻求支撑力，从历史变化中找根据理由，毛泽东就属于这类伟人。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的披露，1958年11月3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消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他统治三十年，人民很高兴那个制度。”（29）“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30）由此可以窥见毛泽东十分迷恋远古时代的平均主义，迷恋舜尧时代（“六亿神州尽舜尧”），迷恋桃花源世界（“桃花源里可耕田”），还找到三国时候的张鲁为他在1958年全国实行“吃饭不要钱”买单。所以毛泽东是伟人中很典型的历史崇拜迷，是一位具有浓厚的“法古”价值取向，头脑里充塞着“封闭精神”的人，是一位动辄依照古人的遗教来认知世界的教条主义者。他忘记了历史不能复制，忘记了辩证法的祖师爷赫拉克利特说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名言。一句话，毛泽东意欲革命，破旧立新，而实际结果却是倒退复古，这不能不引人深思。正如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自汉代罢黜百家一尊孔孟以来，除了几个插曲之外，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很少不在孔制‘正统’牢笼之下。中国文化既以‘法古’为价值取向，于是学人士子谈道论事动辄援引远古权威。在远古权威中最显著的就是‘诗云’、‘子曰’。这种办法，从董仲舒开始，经历历代官司提倡，已经牢不可破地制度化了。自此以后，中国虽然经历了许多血流满地的朝代变更，这一制度却代代一脉相承地传衍下来。”（31）毛泽东是二十世纪饱学中国古籍的杰出学人士子，有许多介绍毛泽东嗜书如命的材料可以证实，在毛泽东的书房书架上，卧室的床上到处堆满了线装古籍。毛泽东一生都在古代文化的海洋中游泳搏击，在传统文化中吸取生命营养。因此，毛泽东自然而然养成了浓厚的“法古”价值取向，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照古人的遗教来认知自己所面对的世界。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了一件事：“毛主席善于用典故抒发思想和情感。”他“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军，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来赞扬陈云同志的理财之能。”（32）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的许多文章诗词和讲话中，找到他谈道论事经常援引古代的权威和典故，“诗云”、“子曰”“随手拈来，出神入化，恰到好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我们也可以从项英与毛泽东共事接触观察形成的如下印象得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由此可见，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哺育成就了毛泽东，也使毛泽东犯了大过错，有的过错还荒唐悖理，如1958年的大跃进学张鲁大办公共食堂搞“吃饭不要钱”。世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毛泽东得益于传统文化，也失误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这是值得中国人认真回味的事关现代化，事关建设和谐社会不容忽略的一个大问题。对公有制的传统，不能像列宁毛泽东那样盲目遵从，盲目赞颂；对私有制这种新生事物，也不能像列宁毛泽东那样非理性地把其视为旧事物、万恶之源给予否定扼杀。这是柏拉图用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观察社会世界的结果，严重阻碍了中国由传统封闭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开放的商业社会转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见兴亡知得失，时时注意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的



少走弯路，可以帮助我们比较顺利地实现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过渡转变。

注释：

(1) 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672页

(2)(3)(4)(5)(6)(7)(8)(9)(10)(11)(12)均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31页、31页、58页、62页、59页、188—189页、136页、203页、197页、191页、198页

(13)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208页

(14) (15) 均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207—208页、199页

(16) 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376页

(17) (18) (19) 均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187页、198—199页、173页

(20)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1516页

(21) 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158页

(22)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399页

(23) 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01页

(24) 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202页

(25) (26) (27) 均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754—755页、762页、926页

(28) 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367页

(29) (30)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775页、776页

(31) 见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158—159页

(32)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89页

来源：[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3-05-14 | 责任编辑：王梦瑶